

中泰友谊金色 50 年：成就与发展

侯 胜 余海秋 段立生 周方冶

袁春生 朱贵平 唐旭阳

摘要：中泰建交 50 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稳步形成了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安全合作、社会文化互鉴的积极态势。2022 年，中泰两国进一步确立了“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发展目标。当下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泰关系也面临诸多机遇。从外部来看，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加剧，国际与地区局势日趋复杂；从内部来看，泰国正处于现代化道路“再选择”，代际分歧引发的社会矛盾与政治分歧不断增加。回顾中泰友谊金色 50 年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与教训，将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从而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前进道路。

关键词：中泰关系；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安全互助；中泰命运共同体

收稿日期：2025—07—15

作者简介：侯胜（1969—），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区域经济与区域国别研究；余海秋（1980—），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泰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段立生（1944—），中山大学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泰国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周方冶（1979—），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泰国研究所名誉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袁春生（1977—），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泰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泰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朱贵平（1979—），云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一级翻译、南亚东南亚区域农业合作研究中心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泰国政治与外交研究；唐旭阳（198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南亚学院（东南亚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泰国社会与文化研究。

新时期中泰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

侯 胜

中泰建交 50 年来，双边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并确立了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目标。然而，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从而使中泰关系面临诸多新现象与新问题。对此，习近平主席于 2025 年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时强调指出，要“以中泰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①，从而为新时期中泰战略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中泰两国如何准确把握情势，有针对性地加强沟通与协调，进一步提升“稳定性”与“确定性”，积极“化危为机”，从而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也就成为当前学术界与实务界的重要议题。

一、百年变局下中泰关系面临的现实挑战

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东升西降”态势日趋明显，使得包括泰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从双边到多边、从国内到国际、从经济到安全、从政治到文化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持续冲击。这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泰关系长期以来的“稳定性”与“确定性”产生结构性影响，因而，亟待加以调适应对。具体来看，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外源风险：面临中美博弈下“选边站”美国压力

作为美国传统军事盟国，泰国在中美泰三角关系中，始终遵循传统的“风中竹”策略，试图以“对冲”方式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此举曾为泰国提供了诸多地缘政治红利。例如，由于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①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5 年 2 月 6 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2/t20250206_11550000.shtml。

泰国很大程度上分享了中国“转口贸易”红利。据统计，泰国对华贸易逆差从 2018 年的 196 亿美元增至 2024 年的 450 亿美元，同期泰国对美贸易顺差则从 170 亿美元增至 460 亿美元。中美作为中美泰非对称性三角关系的两大施力方，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泰国作为受力方正面临日益增强的地缘引力牵扯，美国对泰国的“选边站”压力不断加剧。2025 年 4 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关税战”，宣布将对贸易伙伴设立 10% “最低基准关税”，并对部分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其中泰国将被征收 36% 的高额关税。从美泰关税谈判来看，虽然泰国承诺将增购美国商品，包括玉米、大豆粉、原油、乙烷、液化天然气、汽车和电子产品等，进而将对美贸易顺差降至 200 亿美元，但被美国单方面推迟谈判时间。究其原因，关键是美方诉求远不止于泰国增加自美进口以降低贸易顺差，而在于意图从根本上抑制中泰蓬勃发展的经贸合作，甚至要求泰国追随美国共进退，对华“脱钩断链”。这对泰国而言，形成了相当严峻的外部压力。作为外向型经济体，泰国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60%，而美国则是泰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2024 年，对美出口占泰国出口总额的 18.3%，短期来看根本无力独自化解来自美方的关税冲击。

与此同时，美国对泰施压也开始从经济领域进一步扩展到地缘安全领域。2025 年泰柬爆发边境武装冲突，美国借机插手地区安全事务，以提高关税为威胁，无视泰国合理主张，强行要求泰柬两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见证下签署《吉隆坡和平协议》，并要求排除中国影响。虽然泰国在美国压力下签署了协议，但也明确表示不会在国家核心利益上让步。协议签署后不足 1 个月，泰柬边境冲突再起，泰方随即中止协议。对此，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如果美国在暂停其要求的和平协议后采取更严厉的关税措施，泰国将寻求其他贸易伙伴。”^①

（二）内生风险：面临泰国现代化道路的“再选择”困境

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曾效仿美西方推行“全面自由化”的发展道路，虽然一度享受了烈火烹油般的泡沫繁荣，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崩塌，不仅社会经济遭受重创，而且

^① 曼谷邮报：《总理担心美国加征关税》，<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3136090/pm-wary-of-us-tariff-hike>，2025 年 11 月 13 日。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失去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历史契机。21 世纪以来，泰国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在新兴资本集团及中下阶层支持的“他信经济”道路与保守阵营支持的前国王拉玛九世“适足经济”道路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与社会撕裂，甚至导致大规模暴力冲突，代际分歧引发的社会矛盾与政治分歧不断增加，使得泰国陷入现代化道路的“再选择”困境。

不过，得益于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泰国通过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依然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态势，并取得了 GDP 从金融危机后的 2001 年 1203 亿美元低点，到 2019 年 5440 亿美元历史新高的连续翻番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泰国的国内转型压力与社会矛盾，并成为 21 世纪以来中泰关系蓬勃发展的重要压舱石。虽然泰国在过去近二十年里，曾长期处于“挺他信—红衫军”与“反他信—黄衫军”的“保革冲突”乱局，但无论革新派上台，还是保守派执政，都始终奉行对华合作的战略方针。

然而，随着中泰经贸合作的全面深化发展，泰国现代化道路“再选择”困境的负面影响也在持续上升。一方面，泰国持续性的“保革冲突”，使其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体制机制改革进程明显滞后，逐渐成为阻碍中泰经贸合作前进步伐的重要障碍。例如，虽然中泰两国社会各界长期以来都在呼吁推进便利化跨境人员流动，但直到 2023 年“保革和解”后“红蓝联盟”上台执政，赛塔总理才得以推动落实中泰互免签证。至于泰国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非关税贸易壁垒、土地权益管理无序等诸多问题，则始终未能得到系统有效的解决。另一方面，泰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展缓慢，使得中泰经贸合作的成长空间受限，并开始在传统产业领域形成“内卷式”竞争。据统计，仅 2025 年第一季度，泰国当地就有 71 家钢铁工厂倒闭。对此，泰国极右翼保守政党联建泰党秘书长、工业部长阿卡纳特明确提出了针对外资钢铁企业的问责政策与严管立场，并极其少见地得到了当地极右翼与极左翼双方政党、非政府组织、社交媒体等力量的认可与支持。

二、“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机遇

当前，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

演进，对中泰关系而言，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充满着机遇。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有利因素。

（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拓展中泰合作空间

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在该全球治理体系下，存在各种不公平规则和制度缺陷，更有利于垄断资本在全球配置并获得超额利润，导致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大，而且面临日益严重的国际公共产品匮乏，导致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以及科技进步引发的深海、极地、外太空、网络和数字、人工智能等新领域的全球治理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从而造成了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共识，以四大全球倡议为道路指引，以“一带一路”及金砖合作为务实行动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浪潮，正得到全球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与拥护。

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泰国社会精英特别是技术官僚集团拥有强烈的“外交自信”，使其在面对大国博弈时，既不会被动采取顺从的“事大主义”，也不会消极回避甚至试图与各方拉开距离，而是会积极主动对冲以争取更多筹码，拓展在大国罅隙间的生存空间。因而，随着泰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并成为金砖国家伙伴国，中泰战略合作开始不断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发展进程，双方“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①。这不仅为泰国对冲“选边站”的美国压力提供了多边平台的有效支撑，而且为中泰战略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全方位跨领域多层次的互利共赢格局。

（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激发中泰合作动能

早在 2012 年 4 月，中泰两国就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关于面向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5 年 2 月 8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1207_676944/202502/t20250208_11551388.shtml。

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中国成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泰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地，是泰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承建方来源地，也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近年来，美西方“逆全球化”趋势持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从而深刻改变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的重构态势。这就在根本上进一步激发了中泰经贸合作的新动能。

从贸易来看，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进而为泰国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增量市场。目前，中国市场吸纳了泰国四成以上的农产品出口，并且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自中国举办进博会以来，泰国先后有近 400 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超 2.8 万平方米。2024 年第七届进博会，泰国参展企业更是达到 80 家，创下历史新高。

从投资来看，中国对泰产业转移稳步增加，进而有效提升了双方产业链供应链的相互依赖度。据统计，中国对泰直接投资占外国对泰直接投资比重已从 2012 年的 1.45% 稳步增至 2023 年的 5.17%。2024 年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更是同比猛增 56%，达到 31.6 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大外商投资来源国。

从新兴领域来看，中泰双方将“深化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更加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①，为泰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亟需的资金、技术与人才，进而有效拓展中泰经贸合作的成长空间。随着华为、中兴、天合光能、阿里巴巴、比亚迪、长城等企业在泰投资项目相继落地，中泰双方在新质生产力产融合作方面已取得重要成效。

（三）次区域合作深化发展夯实中泰合作基础

对于紧邻但不接壤的中泰双方而言，次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的基石作用。泰国凭借东盟地理中心的战略区位、稳定的社会治理体系及高度开放的营商环境，已成为中国企业布局东南亚的核心支点。近年来，全球化进程在美西方影响下持续退潮，而区域 / 次区域合作却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对此，中泰双方将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推动区域合作，并“致力于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①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新华社，2025 年 2 月 6 日，<http://www.cidca.gov.cn/20250207/d5cf8bc3dbe34cc1b9007d691e89f6a9/c.html>。

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推进次区域合作”，并“深化区域互联互通、水资源管理、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合作，应对空气污染、跨境犯罪等紧迫挑战”。^①

其中，面向印度洋的国际陆海大通道建设，无疑将成为中泰战略合作的“大动脉”。目前，从中国“成渝经济圈”出发，经中老铁路，接驳泰国国内铁路，最终由泰国拉廊府入印度洋的多式联运已成功贯通，进而为化解“马六甲困境”，推动中南半岛内陆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中泰铁路建设稳步推进，泰南陆桥项目有序起步，以及环孟加拉湾港口合作深化发展，横贯泰国全境的“中老泰—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既承载着泰国从“米轨时代”迈向“高铁时代”的产业梦想，也寄托着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共赢愿景，必将为中泰战略合作注入澎湃的成长动力，有效推动沿线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进一步夯实“中泰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基础。

三、结语

对于新时期的中泰关系发展而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为了更好抓住机遇、规避风险，甚至有效“化危为机”，除了要有大局观，积极以多边合作推动双边合作，还要有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更要重视民心相通，尤其是要促进两国新生代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夯实“中泰一家亲”理念在年轻一代中的基础，“要加强青年交流，使两国人民心更近、情更深，丰富中泰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内涵”^②，从而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更广阔的康庄大道，开启中泰共同繁荣的下一个“金色 50 年”！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关于面向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国政府网，2025 年 2 月 8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2/content_7002811.htm。

② 《习近平同泰国总理巴育举行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1 月 1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2211/t20221119_10978187.shtml。

中泰关系：从“求同存异”到“命运共同体”

余海秋

中泰两国地缘相近、人文相通，传统友谊渊源深厚。但进入近代后，受殖民扩张与国际格局变动影响，中泰双边关系持续下行，冷战期间更因意识形态与地缘阵营差异陷入低谷。1975 年中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双边关系进入制度化发展轨道。此后 50 年，两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通过战略互信的累积、合作领域的拓展与共识基础的深化，逐步实现了从“求同存异”的务实合作到“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协同，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友好互动提供了实践样本。这一进程的核心驱动力，在于中泰双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发展障碍的共同克服与发展机遇的共享，其演进轨迹可划分为安全引领、经济引领与共识引领三个阶段，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合作特征与动力机制。本文将系统梳理中泰关系 50 年演进的阶段特征与内在逻辑，揭示其从安全共识到经济协同再到发展理念共鸣的递进规律。

一、安全引领阶段：地缘政治共识的构建与关系正常化

1975 年中泰建交于冷战格局渐趋松动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一阶段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随着美苏对抗态势的缓和，东南亚地区长期存在的安全冲突出现转圜空间；另一方面，区域内国家普遍将发展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经济现代化诉求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中泰关系实现了战略性突破。两国通过建立制度性合作框架、完善双边对话机制以及持续开展高层互访，逐步在三个层面形成地缘政治共识，推动双边关系从疏离走向紧密。

（一）理念契合：发展路径的双向探索

中泰关系的渐趋紧密，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现代化发展潜力，为地区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源于泰国在“跨

越式”发展中对自身路径的再探索。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① 同期泰国首位民选总理差猜·春哈旺提出“变印支战场为商场”的政策，^② 中国改革开放通过市场化改革、产业升级释放的经济增量，形成“发展外溢效应”，契合地区合作“互利性”本质。二者理念的契合，不仅为后冷战时期中泰合作动力从安全驱动到经济牵引的转换奠定了思想基础，还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对今后中南半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稳定以及泰国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制度奠基：双边合作框架搭建

从 1975 年中泰建交至 1999 年《关于二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的发布，构成中泰关系复苏与上行的关键期。这一阶段，两国通过制度化安排强化合作根基：1981 年建立外交部年度磋商机制，为双边沟通提供常态化平台；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密集签署协议，包括 197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8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关于旅游合作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引渡条约》、199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关于民商事司法协助和仲裁合作的协定》及 1997 年《中泰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③ 等，构建起多维度的法律框架。同时，1976 年泰中友好协会与 1987 年中泰友好协会的成立，作为民间外交载体，进一步拓展了双边关系的社会基础。

（三）互信深化：高层引领与“中泰一家亲”的培育

历经国际与地区局势的多重考验，中泰双边关系展现出较强韧性。无论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还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中泰关系均未受到根本性冲击，反而在危机中深化

①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外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84 页。

② 周明伟：《差猜政府的“变印支战场为商场”政策》，《南洋问题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 55 页。

③ 刘旭：《中泰经贸合作大事记》，《国际商报》，2024 年 2 月 19 日。

合作。近年来，面对大国博弈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挑战，两国在公共卫生、供应链稳定等领域加强协调，凸显战略互信的深度。

中泰建交 50 年间，高层交往的高频化成为中泰政治互信的重要支撑。中国历届领导人均访问过泰国，从周恩来总理的奠基性访问，到习近平主席 2019 年对泰国的国事访问，均体现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泰国王室、政府、议会及军队高层亦多次访华，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动格局。泰国诗琳通公主自 1981 年首次访华以来，累计访华五十余次，足迹遍及中国各省，深入参与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2019 年 9 月 1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泰国诗琳通公主“友谊勋章”。两国高层的友好往来，如走亲戚般，使“既是近邻，也是亲戚”的中泰两国越走越亲。

2012 年后，中泰高层互访频次进一步提升，推动“近邻 + 亲戚”的特殊关系持续深化。中泰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设立副总理级经贸联委会、外交磋商等机制，确保高层战略沟通的制度化。泰国巴育政府时期（2014—2023 年），两国领导人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澜湄合作等多边平台保持密切互动。2022 年习近平主席会见泰国总理巴育时，双方签署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计划，将“中泰一家亲”的传统情谊提升至新高度。2025 年 2 月 6 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佩通坦。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泰建交 50 周年暨“中泰友谊金色 50 年”，双方要继往开来、携手前行，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更多惠及地区和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泰双方要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以中泰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①

二、经济引领阶段：政策协同与经贸融合升级

中国改革开放与泰国“变印支战场为商场”政策的目标相近，构成冷战后中泰经贸合作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一阶段，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张，合作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互补共赢的发展格局。

^①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5 年 2 月 6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502/t20250206_11550000.shtml。

（一）萌芽起步（1975—1982年）：“资源—能源”互补体系的形成

1975 年 7 月中泰正式建交后，两国政府为突破经贸往来的制度壁垒，积极推进双边合作机制建设。经过多轮外交磋商与经贸谈判，双方于 1978 年 3 月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贸易协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经济合作联合会协定书》。这两项基础性法律文件系统地构建了关税优惠、贸易结算、投资保护等制度框架，并建立常设性经济合作联委会机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在制度红利的持续释放下，中泰贸易规模呈现跨越式增长。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1982 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4.69 亿美元，较建交初期的 1975 年增长近 3 倍，创下 1975—1982 年间的历史峰值。^①这一时期中泰贸易发展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在商品结构方面，形成以泰国优质大米与中国石油产品为核心的双向贸易流，其中大米贸易占泰国对华出口总额的 62%，石油制品占中国对泰出口的 58%；在贸易模式上，初步建立起“资源—能源”互补型贸易体系，充分体现了两国在农业资源与工业产能方面的禀赋优势。

（二）调整优化（1983—1986年）：贸易结构的多元转型

20 世纪 80 年代，泰国政府为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优化国内能源消费结构，开始大力推进能源多元化战略。随着泰国湾天然气田的勘探与开发，天然气在泰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显著提升，逐步替代了部分石油需求。这一转变直接影响了中泰贸易格局——中国对泰国的石油出口量大幅削减，导致双边贸易额在短期内出现小幅下滑。然而，这一调整并未对两国经贸关系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反而成为贸易结构优化的契机。泰国在减少石油进口的同时，扩大了对中国机械设备、化工产品 & 轻工业品的采购，而中国则增加了对泰国天然橡胶、热带水果及电子零部件的进口。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泰双边贸易额逐步回升，并呈现更加多元化的态势。

^① 王勤：《“中泰一家亲”：经贸合作的金色 50 年》，《中国对外贸易杂志》，2025 年第 4 期，第 7 页。

（三）高速增长（1987—1997年）：投资驱动的“黄金发展期”

20 世纪 90 年代，中泰贸易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贸易规模、品类与领域均实现突破。198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与 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贸易政府关于经济和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与落实，为双向投资与跨境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政策支撑。1994 年，中国跻身泰国十大贸易伙伴，泰国位列中国第十八位贸易伙伴，标志着双边经贸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初步显现。

（四）多维拓展（1998—2012年）：伙伴关系升级与依存深化

此阶段，中泰贸易额稳步增长，合作领域向金融、农业等多领域拓展，推动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1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银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强化了金融合作；2003 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的果蔬零关税协议，打开了农产品贸易新局面；2009 年中泰两国签署《扩大和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的协议》，进一步拓宽了合作边界。至 2010 年，中国成为泰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与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泰国则成为中国第十五位贸易伙伴，双边经济依存度显著提升。

三、共识引领阶段：发展共识与命运共同体构建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对西方“全面自由化道路”的反思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共同推动中泰关系进入以发展共识为核心的新阶段。2013 年以来，两国在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深度融合，2022 年确立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命运共同体”目标，标志着双边关系进入新的历史维度。

（一）安全协同：双边稳定应对外部风险

21 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推动其承担更多大国责任，成为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从次区域的澜湄合作，到区域的“10+1”“10+3”合作，再到跨区域的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中国的作用持续凸显，为中泰关系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并拓展了空间。对泰国而言，深化对华合作有助于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外溢效应，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两国先后签署《文化合作协定》（2001 年）、《刑事司法协助条约》（2003 年）、《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定》（2007 年）、《教育合作协议》（2009 年）等文件；2025 年 2 月泰国总理佩通坦访华期间，双方签署 14 份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海关便利化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强化了双方安全与发展的协同。

（二）经济赋能：战略对接与支撑泰国经济转型

泰国推出的“国家 20 年发展战略规划”“工业 4.0”“东部经济走廊建设”“生物、循环、绿色（BCG）新经济模式”等战略，紧扣时代发展脉搏，与中国倡导的互利共赢、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形成呼应。中国明确将泰国上述规划纳入双边合作优先领域，积极支持“东部经济走廊”建设与“BCG 模式”落地，推动“经济韧性、高质量发展、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深度协同，为泰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实打实的资金注入、先进技术支持与广阔市场渠道支撑。

（三）民心相通：旅游业复苏促进人文与社会交流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消费能力显著提升，这直接推动了出境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长，而拥有独特热带风光、浓郁人文风情与便捷配套设施的泰国，成为这一趋势中的主要受益国。2012 年，中国赴泰游客数量达到 270 万人次，首次超越其他国家及地区，成为泰国最大海外客源国，并凭借稳定的游客基数与深厚的旅游吸引力，持续保持这一核心地位 2023 年中国赴泰游客逐步恢复至 270 万人次，2024 年在中泰互免签证政策的强力推动

下，游客量大幅增至 670 万人次，旅游业的强劲复苏不仅带动了泰国相关产业回暖，更持续为两国人文交流搭建桥梁，为社会互信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四）资本流动：中国资本助力泰国应对风险挑战

21 世纪以来，中泰双向直接投资格局呈现显著变化，泰国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从 2007 年的 11.58% 逐步降至 2023 年的 2.39%，而中国对泰直接投资占比则从同期的 1.45% 稳步升至 5.17%。尤其在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对泰投资聚焦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持续保持增长态势。中国资金与技术的精准注入，不仅为泰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更助力其有效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与出生率下降等长期发展挑战，为双边经济合作注入持久动力。

（五）文明互鉴：现代化进程中凝聚共识

泰国在重塑“泰式民主”的进程中，始终以文化为重要支撑：一方面积极加强与东方国家的多元文化交流，汲取文明互鉴的智慧；另一方面着力推动本土传统文化的“再发现”，深挖佛教文化、宫廷艺术、民俗礼仪等资源的时代价值，以此提升国民文化自信与国家软实力。2023 年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其中“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张，精准契合泰国文化发展需求，获得泰国政府、学界及民间的积极响应，为中泰文化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提供了清晰的理念指引与广阔的合作方向。

四、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泰关系于“中泰友谊金色 50 年”之际迈入历史新高度。面向未来，中泰双方需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以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构建更为稳定、繁荣、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中泰建交的传统友好基石牢固

段立生

中泰建交的传统友好基石十分牢固，因为它是建立在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的朝贡关系基础之上的。其表现为：这种传统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千余年来延绵不断；互利互惠，两相情愿；来往频繁，长期保持高度热情。

根据现存中文古籍的记载，中国官方与泰国地区很早就有交往。公元 1—5 年，汉朝使节乘船从广西合浦港出发，沿南中国海而行，穿过暹罗湾，弃船步行跨越克拉地峡，然后又重新登船，渡安达曼海，抵达印度。在这段汉使行程中提到的位于马来半岛东岸的谿离国和位于西岸的夫甘都卢国，就是现今泰国版图内最早出现的两个城邦国家。这是中国使节访问现今泰国地区的最早记录，亦是海上丝路的滥觞。

《梁书·狼牙修传》说：

天监十四年（515 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无量。端严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间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耀，亦如月光。诸天善神之所供养，以垂正法宝，梵行众生，庄严都邑，城阁高峻，如乾陀山。楼观罗列，道途平正。人民炽盛，快乐安稳。著种种衣，犹如天服。於一切国，为极尊胜。天王愍念群生，民人安乐，慈心深广，律义清静，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布满世界，百姓乐见，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归依。敬礼大吉天子足下，犹如现前，忝承先业，庆嘉无量。今遣使问讯大意，欲自往，复畏大海风波不达。今奉薄献，愿大家曲垂领纳。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公元 515 年狼牙修国贡使阿撒多送交梁朝皇帝的表文，表文中尊称梁朝皇帝为大吉天子，并有许多溢美之词，显示了两国关系友好融洽。狼牙修国遣使朝贡，纯属自愿，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因素的胁迫。本来其国王婆伽达多是想自己亲自来中国的，但畏

惧大海风波才改派贡使，现今贡使阿撒多的画像还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

从公元 1 世纪至 13 世纪素可泰王朝建立，现今泰国版图内相继出现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都和中国保持朝贡往来，如金邻国、盘盘国、堕罗钵底国、赤土国、女王国等。公元 1238 年建立的素可泰王朝是泰国历史上由泰族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奠定了现代泰国的立国基础。中国元朝与素可泰王朝往来更加频繁，朝贡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其内涵进一步拓展，趋于完备和丰富。朝贡成为一种制度。

根据《元史》的不完全统计，至元十九年（1282 年）、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至元三十年（1293 年）、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元贞元年（1295 年）、大德元年（1297 年）、大德三年（1299 年）、大德四年（1300 年）、延祐元年（1314 年）、延祐六年（1319 年）、至治三年（1323 年），两国皆有使节往来。元朝时期，素可泰入贡十多次，两国关系密切。中文史籍称素可泰王朝为暹国，称泰南同时存在的华富里政权为罗斛国，罗斛入贡 5 次，可见素可泰与中国的关系更为亲近。中国人开始移民泰国，素可泰最有名的宋加洛陶瓷就是中国工匠帮助建窑烧制的。

到了明朝时期，“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暹罗斛。”^①暹罗斛后来简称暹罗，即泰国古名的由来。根据《明实录》和《明史》的统计，在明朝存在 276 年的时间里，明朝遣使暹罗 19 次，暹罗遣使中国 110 次。朝贡的内涵扩大为一种政治交往的外交手段，也是经济互利的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

其一，政治交往的外交手段。

从政治上说，明朝和暹罗双方皆有建立朝贡关系的需要。阿瑜陀耶王朝建立比明朝早 18 年。甫建之初，国内面临彭世洛、柯叻、洛坤等地方豪强势力的反抗，国外面对安南、缅甸的觊觎。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只有争取亚洲泱泱大国中国的支持来稳固政权。因此，暹罗多次主动遣使中国，要求明朝颁给金印及勘合底簿，作为维持朝贡关系的凭证。对明朝来说，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对南海诸国，只求保境安民，维系安宁。朱元璋在《皇明祖训箴戒章》里告诫后世子孙说：

^① 《明史》卷 324，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8396 页。

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量力，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可以认为，明朝的基本外交策略是北拒强敌、南抚诸邦，“中国安而四方万国附顺”。

在这种条件下，双方的诉求一拍即合。洪武三年（1370 年），朱元璋即位才 3 年，便第一次“遣吕俊等诏谕暹罗”^①。此后，两国王室礼尚往来不断，帝王生日，婚丧嫁娶，皆互送礼品。遇到暹罗老王驾崩，新王继位，明朝都要遣使吊唁，册封新王。表面上看，册封新王是行使宗主主权，但实际上明朝没有且不可能干预暹罗国王的废立。使节的往返更多是为处理两国间的一些具体事务。比如，永乐七年（1409 年）明政府通过暹罗贡使要求暹罗遣返中国逋逃者何八观等人。^②又如，1419 年暹罗出兵攻打满刺加。明遣使对暹罗国王说：“两兵相对斗，势必俱伤”“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③终使暹罗接受调解，弭兵消灾。

其二，经济互利的官方贸易形式。

从经济角度看，朝贡是一种官方贸易形式。明政府自持“天朝无所不有”，采取“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的方针，除大量“赏赐”礼品钱钞外，还允许贡使将随船带来的货物开市出售，免征货税。朝贡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官营贸易。“虽云修贡，实则慕利。”

其三，人员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通过“抚谕”和朝贡，人员和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历次随贡使来中国的暹罗人很多，据《明实录》统计，永乐三年 50 人，永乐十八年 80 人，永乐十九年 60 人，宣德三年 42 人，同年还有一次 45 人，宣德四年一百余人。前后达数百人次。明朝派往暹罗的人数也不少，

① 《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抄本，卷 55，第 3 页。

② 同上，卷 66，第 8 页。

③ 《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抄本，卷 114，第 9 页。

洪武十一年“使暹罗斛将士311人还京师”^①。这是在郑和航海之前。宣德至永乐年间（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每次率领将士上万人，阵容更是庞大。

曾经来中国的暹罗贡使中，以阿瑜陀耶王朝六世皇昭禄群膺最重要。他在位期间，竭力与明朝修好，先后21次遣使中国。明朝表彰他“有道于邦家，臣民欢恱”，赠他“驼纽镀金银印”。他逝世时，明朝派中官郭文专程去祭悼。

明朝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莫过于郑和七下西洋。下西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恢复和拓展海上丝路，诏谕沿线国家来中国朝贡，实现万邦来朝的宏图。明朝为了应对频繁的外国来贡，于永乐五年（1407年）开设四夷馆，作为官办的第一所专门教授周边国家语言文字的学校。最初只设鞑靼、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等馆。正德六年（1511年）增设八百馆，教习以清迈为中心的兰那泰文。万历六年（1578年）增设暹罗馆，教习现代泰国使用的泰文。教员从暹罗来的贡使中选拔，学员皆世家子弟，从此开启了中国培养自己的泰文翻译的时代。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有两次明确记载到达暹罗。一次在1401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暹罗与满刺加发生矛盾，郑和为之调解。另一次在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暹罗条说：“中国宝船到暹罗，亦用小船去做买卖。”^②郑和在暹罗留下很大影响，现今泰国华侨中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神话传说。较郑和稍晚的明朝人张燮在《东西洋考》里说，暹罗有郑和名字命名的“三宝港，是港无鳄鱼；第二关有三宝庙，祀太监郑和”。这些遗址现今仍然保存。

1767年暹罗阿瑜陀耶王朝被缅甸所灭，华裔郑信率泰华民众，以泰国东南沿海为基地，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驱逐缅甸侵略者，建立吞武里王朝。吞武里王朝刚建立，就派人向清政府请求建立朝贡关系。乾隆皇帝认为，郑信非王室后裔，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拒绝了郑信的请求。经过郑信多年的努力，乾隆皇帝看到他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最终同意恢复朝贡关系。

郑信经过充分准备，于1781年派出以披耶逊吞那排亚突为贡使，

① 同上，卷121，第5页。

② 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2页。

包括王子銓利陀提奈毗罗和诗人摩诃奴婆在内的庞大外交使团，5 月从暹罗出发，分乘十一艘大船，满载象牙、犀角、苏木、藤黄等货物，7 月抵达广东。摩诃奴婆曾作《广东纪行诗》，记述了这次外交活动。1782 年，在暹罗使团回国之前，暹罗国内发生政治骚乱，曼谷王朝取代吞武里王朝。

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即位后，鉴于郑信因为不是王室后裔曾遭清政府拒绝建立朝贡关系的先例，谎称自己是郑信之子郑华，曾致书清政府说：

不幸小邦福薄，于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祸延亡父，昭因病身故，临终之际，嘱华慎重勿改旧制，当以社稷为念，天朝是遵。……俟至贡朝，华当遵例虔备方物朝贡。^①

曼谷王朝顺理成章地接替吞武里与中国清政府继续维系朝贡关系，并且做到了“慎重勿改旧制”。曼谷王朝与中国清政府的朝贡关系始于拉玛一世，终于拉玛四世。其中拉玛一世时期遣使中国 15 次，拉玛二世时期 9 次，拉玛三世 9 次，拉玛四世 2 次，70 年间共计 35 次，平均 2 年 1 次，超过了 3 年一贡的规定。这说明曼谷王朝初期对进贡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朝贡贸易给暹罗带来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可是，1852 年最后一次朝贡后暹罗就再没有遣使中国，原因据说是 1853 年 6 月 15 日暹罗贡使回国途中在河南商丘遭到盗贼抢劫。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势日衰，风光不再。暹罗于 1855 年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鲍林条约”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要求暹罗打开国门。在此情况下，拉玛四世学习西方，推行行政制度改革，直面西方的关税贸易，力图将暹罗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尽管当时暹罗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中处于劣势，但他决心抛弃一直以来与中国的朝贡贸易，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这就是拉玛四世的选择，亦是中暹朝贡关系终结的根本原因。

^① 段立生：《郑信中文史料汇编》，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2 页。此段文字由段立生在故宫博物院摘抄，引自《清史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卷号第 1225 号，暹罗国长郑华致清廷国书原文。暹罗国长郑华，即拉玛一世，本名通銓却克里，1782 年建立却克里王朝，又称拉玛王朝或者曼谷王朝，他在位期间确定了与清朝的宗藩关系。

中泰建交以来政治互信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周方冶

中泰建交前，由于受冷战阵营对抗的负面影响，中泰双方在政治上曾一度严重缺乏互信。从 1950 年泰国参与朝鲜战争，到 1954 年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到 1962 年签发《塔纳特—腊斯克公报》进一步巩固美泰军事同盟关系，再到 1964 年参与越南战争，中泰关系在冷战前期降至历史冰点。1975 年中泰建交后，两国政治互信得以恢复并稳步提升，不仅为双边关系在过去 50 年里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使其“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①。那么，中泰政治互信关系何以会呈“V”形走势？又何以能实现持续向好发展？本文将就此加以探讨和分析，旨在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时期“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借鉴，力求“以中泰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②。

一、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是根本保障

中泰建交 50 年来，尽管国际与地区局势风云变幻，但双方始终保持政治互信，很重要的就是两国长期保持高层密切交往，从而有效避免了政治误判风险，切实提升了中泰关系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1978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成为两国建交后首位访问泰国的中国领导人。自此，中泰高层开启了日益密切的交流与沟通，李先念主席（1985 年）、李鹏总理（1988 年、1990 年）、杨尚昆主席（1991 年）、江泽民主席（1999 年）、李鹏委员长（1999 年、2002 年）、胡锦涛副主席（2000 年）、朱镕基总理（2001 年）、胡锦涛主席（2003

① 《习近平会见泰国外长素拉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2 年 7 月 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207/t20120704_9303965.shtml。

②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5 年 2 月 6 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2/t20250206_11550000.shtml。

年）、温家宝总理（2003 年、2009 年、2012 年）、习近平主席（时任国家副主席，2011 年）、李克强总理（2013 年、2014 年、2019 年）等中国领导人都先后访泰或赴泰出席会议。与此同时，泰国历任总理、国会主席和军队领导人亦曾访华。

时至今日，虽然中泰双方已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沟通渠道与协调机制，为两国政治互信提供了有力支撑，但高层交往尤其是元首外交，依然是提升政治互信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通过元首外交，不仅能在紧急状态下及时消除误判，从而增信释疑、化解风险，而且能在重要历史节点，有效推动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2022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赴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泰国。其间，两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王国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泰国王国政府关于中泰战略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6）》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泰国王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从而为新时期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前进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政局长期以来并不稳定，过去 50 年间曾前后更替了多达 33 位总理 / 代理总理，期间更是发生了多达 9 次（未遂）军事政变。仅从政府层面来看，中泰高层交往在提升政治互信方面的可持续性会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不过，得益于泰国较为独特的政治权力结构，泰国王室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政府在对华高层交往方面的不稳定性。

虽然从体制上看，泰国属于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在“泰式民主”意识形态下，泰国王室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一直拥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中泰建交后，泰国王室始终秉持对华友好立场，成为双方政治互信的重要支柱。对此，习近平主席曾评价指出，“泰国王室长期关心重视中泰关系发展，为中泰友好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①

泰国前国王拉玛九世普密蓬十分重视中泰关系发展，不仅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重要成就，而且积极支持中泰文化交流。

① 《习近平就哇集拉隆功就任泰国国王致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6 年 12 月 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612/t20161202_7999506.shtml。

2000年，诗丽吉王后代表普密蓬国王首次访华，更成为“中泰关系史上的一件盛事，充分显示中泰关系非同一般”。^①而作为拉玛九世册封的“女王储”，诗琳通公主则是于2019年成为中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她不仅是首位访华的泰国王室成员，而且在诗丽吉王后指引下于1980年开始学习中文，并在此后四十多年里访华多达五十余次，成为在泰国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

二、共克时艰“化危为机”是重要契机

中泰两国在冷战期间的政治互信“V”形反转实属不易。事实上，即使是在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越战结束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之后，泰国军政府依然坚持对华关系“慢慢来”的不合时宜立场。^②直到泰国“三年民主实验”时期，中泰两国才正式建交。不过，随着1976年泰国保守阵营重新掌权，中泰政治互信再次面临严峻挑战，双边关系回暖步伐也较为缓慢，尤其是泰方在地缘安全问题上依然对华存在战略疑虑。

1978年越南出兵柬埔寨，成为中泰两国构建并持续提升政治互信的重要契机。双方在共同应对中南半岛的地缘安全风险过程中，有效增进了相互理解与认同，并围绕柬埔寨问题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

回顾中泰建交50年来的风雨历程，两国共同面临过诸多国际风险与地区挑战，但双方从未采取过美西方惯常的“以邻为壑”，而是始终秉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共克时艰，从而“化危为机”，不断提升政治互信。对此，习近平主席回顾指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中泰在应对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汶川地震和泰国洪灾等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过程中，始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③

① 《江泽民主席会见泰国诗丽吉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00年11月7日，https://www.mfa.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0011/t20001107_7999211.shtml。

② 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45页。

③ 《习近平会见泰国枢密院主席炳·廷素拉暖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1年12月24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112/t20111224_7999367.shtml。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率先爆发后，中国不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通过双边渠道为泰国提供了高达 10 亿美元的贷款，而且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为缓解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 年“非典”疫情期间，面对美西方部分国家对中国的隔离与封锁立场，泰国表现出共克时艰的积极态度，并作为东道主承办了“中国—东盟非典型肺炎问题特别会议”，为中国提供了有力的外交支持。对此，时任泰国总理他信表示，“中文的‘危机’一词包含了危难和机遇两个方面。泰国愿与中国密切合作，克服非典带来的困难，并使泰中友谊更上一层楼。”^①

新冠肺炎感染期间，中泰双方更是相互支持、共克时艰。2019 年，中国武汉暴发疫情，引发严重医疗物资紧缺。值此困难时刻，泰国政府发布“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网络视频，泰国社会各界更是紧急采购捐赠了大批医疗物资，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支持。此后，当泰国疫情严重时，中国政府也迅速向泰方提供了多批次医疗物资，捐赠大量疫苗，为缓解泰国疫苗紧缺、加强群体防护作重要贡献。^②

三、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是持久动力

中泰两国皆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虽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选择了不同路径，但都始终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③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泰国拥有强烈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并不认同“现代化等同西方化”发展模式，而是坚持自主选择的本土化发展道路。这为中泰两国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进程中携手前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提供了持久动力。

① 《温家宝总理会见泰国总理他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03 年 4 月 30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dqzz_673197/dnygjlm_673199/xgxw_673205/200304/t20030430_7491695.shtml。

② 《继往开来，命运与共，携手开启中泰关系下一个金色 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5 年 3 月 1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wbd_673032/wjzs/202503/t20250313_11574119.shtml。

③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赛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3 年 10 月 1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2310/t20231019_11164199.shtml。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美西方对华质疑与打压持续不断，而泰国则采取了积极对华合作立场，从而在经贸领域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据统计，从中泰建交前夕的 1974 年到冷战结束前夕的 1989 年，中泰双边贸易总额从 339 万美元增至 8.84 亿美元，年均增幅 17.4%，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 1977 年至 1980 年，贸易总额更是从 0.61 亿美元猛增到 4.51 亿美元，近乎每年翻了一番。^①除了贸易之外，作为泰国保守阵营的重要政治力量，曼谷政商财阀也积极推动对华投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正大集团，不仅率先投资中国大陆，成为深圳首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深外资证字 0001 号”，而且在 1979 年至 1989 年间，先后在中国大陆 17 个省市投资 27 亿美元，开设了 28 个项目（公司）^②，为中泰经贸合作树立了榜样。

21 世纪以来，泰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过程中遭遇挫折，引发国内社会分裂与政治动荡。为稳定国内局势，泰国保守阵营于 2014 年接管了国家权力，结果引发美西方的政治施压。美国不仅暂停了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IMT）及外国军事融资（FMF）项目下数百万美元援助，而且大幅减少了双边高层互访。2015 年初，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罗素（Daniel Russell）访泰期间，甚至在朱拉隆功大学演讲中公开批评泰国政府。^③与此相对比，中国则是“重申对泰国政局的理解，支持泰国为实现国家改革、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路线图’所作的努力”^④，并愿意通过交流互鉴，为泰国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近年来，泰国政界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更是为中泰政治互信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作为泰国保守势力代表的军人总理巴育曾表示，“泰方正在探索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希望同中

① 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367—368 页。

② 同上，第 373 页。

③ “Remarks of Assistant Secretary Daniel Russel”, 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angkok, Thailand: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January 26, 2015, <https://th.usembassy.gov/remarks-of-assistant-secretary-daniel-russel/>.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联合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4 年 12 月 24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412/t20141224_9303994.shtml。

方交流互鉴”^①，并且在治国理政方面认真借鉴中国经验，甚至要求内阁成员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②。2023 年大选后，随着泰国开启“政治和解”进程，民选政府上台执政，也依然保持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的浓厚兴趣。赛塔总理表示，泰方“愿意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③，而佩通坦总理更是进一步强调，“希望学习借鉴中方成功的发展经验”^④。

四、结语

中泰建交以来政治互信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得益于两国高层密切交往的保驾护航，而且扎根于双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战略共识，从而能在国际与地区局势风云变幻下共克时艰，“化危为机”，推动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持续升级，中泰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也在不断增加。这就需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作用，并通过高层交往提升战略契合度，进而妥善应对风险与挑战，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前进道路。

①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巴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4 年 11 月 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411/t20141109_9303990.shtml。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泰文版在曼谷正式发行》，2017 年 4 月 8 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4/08/c_1120773816.htm。

③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赛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3 年 10 月 1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2310/t20231019_11164199.shtml。

④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4 年 11 月 16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2412/t20241218_11497824.shtml。

中泰建交以来的经济互利

袁春生

2025 年，中泰两国迎来建立外交关系 50 周年暨“中泰友谊金色 50 年”。经贸合作一直是中泰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从初期小规模贸易往来逐步升级为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利合作格局，贸易、投资、旅游、新质生产力产融合作等重要领域呈现出广阔发展前景，双边经贸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典范。

一、贸易合作：从农产品零关税到全产业链对接

冷战时期，泰国市场仅有少量经转口贸易进口的中国商品。中泰建交前夕，中国以“友情价”对泰国出口石油以缓解泰国高价进口石油的举措，^①促使泰国逐步放开对中国商品的禁令。中泰建交后，巴莫政府颁布条例消除了中泰贸易的政策性阻碍。^②随后，中泰两国贸易发展正常化并快速发展，经历了初步探索（1975—1989 年）、快速拓展（1990—2009 年）、高质量发展（2010 年以来）三个时期，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双边合作政策实现了质的飞跃。目前，中国已连续 12 年成为泰国最大贸易伙伴，泰国则是中国的第十四大贸易伙伴。

（一）贸易规模跨越式增长

中泰建交初期，1975 年双边贸易额仅为 2462 万美元，^③2024 年攀升至 1339.8 亿美元，^④年均增长率达 16.9%。这一增长轨迹形

① 《回顾和展望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泰中传统友谊到经贸伙伴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2021 年 9 月 23 日，http://th.mofcom.gov.cn/zwhd/wzz/art/2021/art_c55438413e734febbaad3b18081de4b2.html。

② 湾乐·民玛尼那钦著，林志鹤译《泰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东南亚研究资料》，1985 年第 3 期，第 18-26 页。

③ 郑国富：《中国与泰国双边贸易合作发展的状况、问题与对策》，《经济论坛》，2014 年第 9 期，第 140 页。

④ 王勤：《“中泰一家亲”经贸合作的金色 50 年》，《中国对外贸易》，2025 年第 4 期，第 7 页。

成了三个关键节点，1991 年贸易额跃升至 10 亿美元，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促进中泰贸易额在 2004 年达到 173 亿美元，2021 年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① 2024 年，中国对泰出口 860.36 亿美元，进口 479.45 亿美元，中国保持较大贸易顺差。^②

（二）贸易结构优化互补性增强

一方面，农产品贸易取得突破性进展。2003 年 6 月，中泰签署关于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③ 10 月 1 日率先对 188 种蔬菜水果实施零关税，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的标志性成果。^④ 该政策叠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的关税减免利好，2024 年泰国水果出口总额达 65.1 亿美元，其中新鲜榴莲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出货量的 97.4%，^⑤ 中国的苹果、梨等对泰国出口，形成农产品互补性贸易结构。

另一方面，工业制成品贸易不断升级。中泰双边贸易从初级产品为主转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电子产品与通信设备、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与原材料、汽车零部件等为主要贸易品。其中，电子产品类，2024 年中国对泰国的电子产品出口额达 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6%，华为、小米等品牌的智能设备在泰国市场占据重要份额；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类，2024 年中国向泰国出口的机械设备总额达到 1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化工产品类，2024 年中国对泰国的化工产品出口额达到 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8%；^⑥ 新能源汽车贸易成为新亮点，中国比亚迪、长城等车企对泰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占据主要市场，中泰两国汽车产业链深度融合。泰国对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化工产

① 王勤：《“中泰一家亲”经贸合作的金色 50 年》，《中国对外贸易》，2025 年第 4 期，第 7 页。

② 高博：《泰国经济“逆浪”奋进》，新华社，2025 年 7 月 4 日，<https://www.xinhuanet.com/globe/20250704/t29ce8f96d064269b127e03e77989380/c.html>。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泰王国政府关于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站，2003 年 6 月 18 日，https://fta.mofcom.gov.cn/china_dongmeng_upgrade/annex/Ching-Thailand_zqshjh-qxgsxy_cn.pdf。

④ 《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进入“E 时代”》，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站，2023 年 3 月 30 日，<https://gxftz.gxzf.gov.cn/index.php?case=archive&act=show&aid=3315>。

⑤ 《泰国水果出口创汇 65.1 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2025 年 3 月 24 日，https://th.mofcom.gov.cn/scdy/art/2025/art_66062c68a651441482c5c84150a6fa47.html#:~:text=。

⑥ 《中国与泰国贸易的核心数据与趋势（2024 年）》，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综合服务网站，2025 年 3 月 28 日，<http://www.cciserv.cn/content/2025-03/28/content10781002.htm>。

品以及橡胶制品等贸易额占较大市场份额。

中泰两国在制造业领域互补性极强。中国向泰国出口的机械设备助力其产业升级，这种产业链协同效应提升了双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当然，中泰经贸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双边经贸合作政策框架的持续完善，双方签署了《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1997 年）、《中泰货物贸易协议》（2005 年）、《中泰服务贸易协议》（2007 年）、《扩大和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的协议》（2009 年）等，多个经贸合作协议发挥了叠加效应。2024 年，中泰又签署《关于深化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金融、物流、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开放，为贸易便利化提供制度保障。

二、投资合作：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投资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中泰投资合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正大集团为代表的企业率先进入中国市场，开创中国吸引外资的先河；中国对泰投资起步较晚，但增长速度快，已成为泰国的主要外资来源国。

（一）泰国在华投资开创先河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确立吸引外资的重要政策，打开引进外部资本、技术和资源的大门。泰国正大集团 1979 年在深圳投资 3000 万美元成立了正大康地公司，取得深圳市“0001 号”外资企业营业执照，^①成为最早投资中国的外资企业。目前，正大集团已建立从饲料生产到畜禽养殖、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

截至 2023 年末，泰国企业累计对华直接投资 47.1 亿美元，^②涉及农业、制造业、房地产及金融等领域。其中泰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如暹罗轮胎、泰丰轮胎等在华设立生产基地，投资从劳动密集型成功转向技术密集型。

① 《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诞生记》，《海内与海外》，2019 年 10 月 3 日，http://hnyhw.org.cn/newscontent_nor.aspx?channel_id=12&id=371&m=a0。

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泰国（2024 年版）》，第 22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s://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taiguo.pdf>。

（二）中国对泰投资向新型领域拓展

中国对泰投资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数据统计，中国对泰直接投资存量 2023 年达到 126.57 亿美元，^① 直接投资流量由 2012 年的 4.79 亿美元上升到 2024 年的 51.39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21.7%。^② 已成为泰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国，投资领域从传统制造业向新能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领域拓展。

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中国企业自 1980 年开始参与承建泰国公路、桥梁、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等工程项目。中泰铁路合作项目是标志性工程，铁路总长约 609 千米，曼谷至呵叻第一期工程预计 2027 年通车。^③ 中国港湾参建的泰国林查班港扩建工程、中国电建承建的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电力项目等，均为泰国基础设施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持。

另一方面，新能源与高端制造投资增长。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直接投资泰国并设立工厂，以支撑泰国 2030 年电动汽车达到年产 72.5 万辆，^④ 进而成为东盟国家电动车制造中心的目标。比亚迪、长城汽车在泰国设立新能源汽车工厂，2024 年在泰销量占当地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48%，并出口至东南亚其他国家。

（三）中泰持续改善双边投资政策和保障机制

中泰两国签署了多项投资协议，如《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1985 年）和《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1986 年）。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为中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土地审批便利等支持。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对泰投资企业近 850 家，涉及制造、

① 王勤：《“中泰一家亲”经贸合作的金色 50 年》，《中国对外贸易》，2025 年第 4 期，第 7 页。

② สถิติการลงทุนโดยตรงจาก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รายเดือนสะสมปี 2567 (มกราคม-ธันวาคม) ,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https://www.boi.go.th/upload/content/FDI%20report%202024%20final_67a058828bd0c.pdf.

③ 《“一带一路”上的新典范——中泰铁路》，世界轨道交通资讯网站，2022 年 7 月 6 日，http://rail.ally.net.cn/html/2022/magfeat_0706/11277.html。

④ 《中国新能源车企出海泰国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5 年 1 月 8 日，<https://fec.mofcom.gov.cn/article/xgzx/xgzxfwydy/202501/20250103559588.shtml>。

贸易、保险、运输、医药等领域。^①同时，双方多次续签《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推动双方银行如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泰国盘谷银行、开泰银行等在对方设立分支机构，为本国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三、旅游合作：实现从游客互访到旅游产业升级

旅游业是泰中友谊的重要纽带。1981 年，泰国公主诗琳通访问中国，首次向中国人民发出“到泰国旅游”的邀请。1990 年 10 月，中国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出台规定，允许中国公民在一定条件下赴泰国旅游。1993 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旅游合作的协定》，为两国旅游交流奠定了政策基础。随着签证政策放宽和交通网络完善，两国旅游产业壮大，转向高质量、新型旅游合作。

（一）旅游市场的规模扩张

2016 年中泰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7 年推出“中泰旅游年”活动，2024 年达成《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两国迈入“免签时代”，促进了“双向奔赴”的旅游热潮，泰国游客则选择中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作为主要目的地。2019 年中国赴泰国游客人数突破 1100 万人次；^②新冠肺炎感染后，泰国旅游市场快速复苏，2024 年赴泰的中国游客恢复至 673 万人次，^③中国成为泰国最大游客来源国。中泰两国互访人数持续增加，双方在旅游合作、市场监管以及安全保障方面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以促进旅游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二）旅游合作产品的多元化发展

泰国佛教文化、传统手工艺与中国历史古迹、民族文化形成互补，泰国企业打造了“泰国村”一类的跨国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吸引大量中国游客前往泰国体验佛教文化。目前，泰国正致力于发展集健康管

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泰国（2024 年版）》，第 22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s://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taiguo.pdf>。

② Tourism receipts from international tourist arrivals January-december 2019, Ministry of Tourism & Sports, <https://www.mots.go.th/news/category/615>。

③ Ibid.

理、疗愈体验于一体的康养旅游模式，吸引越来越多中资企业到泰国发展。在双方共同推动下，医疗旅游日益成为中泰旅游合作的朝阳产业，助力两国旅游合作迈上新台阶。同时，博览会成为“双向旅游”新引擎，中泰依托曼谷、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会展设施，举办各类商务展会，如中国—东盟（泰国）商品贸易展览会、中泰文化旅游产业交流峰会、中泰建交 50 周年“萨瓦滴·您好”系列活动等，成为商务旅游的新热点。

（三）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合作的升级

中国企业参与泰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如中国建筑承接的泰国素万那普机场项目可容纳旅客流量达 6000 万。^①同时，中国旅游平台（如携程、飞猪）与泰国本地旅行社合作，推出定制化旅游产品。此外，中泰航空公司开通了多条直航航线，为旅游交流提供了交通保障。

四、新质生产力产融合作：驱动中泰科技协同创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求着重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既出科技成果，又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中泰两国科技合作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50 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科技创新合作的机制与成果突出

1978 年，中泰两国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中国科技部与泰国外交部（泰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该协定的实施部门，建立了部长级的科技合作联委会机制，截至 2023 年，双方已成功召开了 22 次联委会会议，^②推动的合作项目涉及农业科技、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2013 年，中泰两国科技部签署科技合作协议并正式启动中泰高铁联合研究中心、遥感卫星数据共享与服务平台、中泰技术转移中心、

① 孙广勇：《素万那普机场新候机楼：“给曼谷插上新翅膀”》，人民网，2020 年 9 月 17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062745690373351&wfr=spider&for=pc>。

② 《泰国科技概况及中泰科技合作简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网站，2023 年 12 月 15 日，https://th.china-embassy.gov.cn/chn/ywzn/12g/201407/t20140702_1447506.html#:~:text=

中泰青年科学家交流 4 个重点项目的合作。2019 年，中国科技部和泰国高等教育与科研创新部签署《关于推进科技创新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23 年，中国科技部和泰国高等教育与科研创新部签署《关于共同实施科技人文交流计划的谅解备忘录》。

目前，中泰科技合作成果最显著的是农业领域，两国农业合作涉及农业生物技术、种子改良、土壤改良等研究项目，在农业生产、病虫害防治、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

（二）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领域合作蓬勃发展

泰国于 2015 年提出“数字泰国”理念并出台发展计划以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等迅速发展。2017 年，“数字丝绸之路”的提出，搭建了中泰两国数字合作的桥梁。

政策方面：两国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关于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关于促进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建立了中泰数字经济合作部级对话机制，数字经济主管部门充分利用对话机制平台，加强交流，互学互鉴，互促共进，推动中泰数字经济合作走深走实。

数字技术与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华为在泰国设立 5G 生态创新中心，与泰国国家电信公司（NT）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云与 AI、5G、智慧城市等领域深化合作；华为、中兴、中国移动等企业参与泰国数字基础设施第五代移动网络（5G）建设，同时吸引阿里云、万国数据、秦淮数据、华为等在泰设立数据中心，重点发展 5G 应用、人工智能及跨境电商等，抖音于 2025 年宣布未来 5 年将在泰国追加投资 88 亿美元，助力泰国建立东盟数据中心。^①

数字支付和跨境电商方面：腾讯在泰国推出的微信支付（WeChat Pay）已接入泰国商户近二十万户，支持泰国盘谷银行（BBL）和开泰银行（KPLUS）在海外进行支付；泰国政府和阿里巴巴签订了一系列合作项目，中资企业将在智能旅游、数字经济等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力度。

此外，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国—泰国崇左产业园等合作园区，

^① 《TikTok 宣布在泰投资 3000 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2025 年 3 月 18 日，http://th.mofcom.gov.cn/jmdt/art/2025/art_7244cddb401e4181aa0281fca00af841.html。

已成为中国企业投资泰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

（三）新能源与绿色经济合作驶入快车道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泰两国在新能源领域和绿色经济合作方面签署了多个协议，如《关于可持续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2011 年）、《关于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3 年）、《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水资源合作协议》（2018 年），双方领导人在加强“可再生、替代和清洁能源开发”合作、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经贸领域合作有着高度共识。

目前，中泰两国在新能源与绿色经济合作上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特点，涵盖光伏、风电、电动车、储能、生物质等产业链环节，形成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中国电建、金风科技、中国能建、中国大唐集团等企业承建泰国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 / 垃圾发电合作等项目，帮助泰国实现 2037 年可再生能源占电力结构比例达到 51% 的目标。^①同时，泰国为实现 2030 年前将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减少 20%—25% 的承诺，^②积极发展电动车产业生态，中泰在电池材料、充电设施、车联网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五、结语

中泰建交 50 年来，经济合作从贸易往来起步，逐步拓展至投资、旅游、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等多元领域，形成了“贸易互补、投资协同、旅游互促、科技联动”的互利格局。站在新的“金色 50 年”起点上，中泰经济合作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和澜湄合作机制的深度对接，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经济效应，推动两国持续深化合作，重点在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创新合作，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实现更广泛的经济互利，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保驾护航。

① 王志胜：《深化中泰绿色合作 共筑清洁能源未来》，《中国能源报》，2025 年 5 月 12 日，第 11 版。

② 杨帆：《泰国将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宣布碳中和目标承诺》，中国青年报，2021 年 11 月 1 日，https://s.cyol.com/articles/2021-11/01/content_kvWbzGh4.html。

中泰建交以来的安全合作及其当代价值

朱贵平

中泰建交 50 年来，两国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了广泛且富有成效的合作。健康稳定的安全合作不仅是衡量两国关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更是确保两国共同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携手合作打造“中泰一家亲”的特殊友谊关系、确保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一、中泰安全合作的持续深化与发展

不管是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两国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安全合作格局，取得了丰硕成果，深化了双方的战略互信，丰富了双边关系的内涵，为双方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对中泰关系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高层频繁互访为中泰安全合作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中泰安全合作的首要特征就是高层引领。中泰建交以来，两国军政高层保持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繁互访，泰国王室成员也多次访华，特别是诗琳通公主已 55 次访华^①。2022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对泰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领导人就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标志着中泰关系步入新时代。2025 年 2 月，泰国总理佩通坦正式访华，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支持泰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泰方则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

^① 《王毅会见泰国公主诗琳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5 年 4 月 11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_674881/202504/t20250411_11593193.shtml。

“台独”主张。^①这种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体现了中泰传统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础。双方军政高层通过交流互访，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寻求合作共识，为两国军队、安全部门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合作构建了中泰战略互信的基石

中泰双方在国防军事领域建立的机制化合作安排，为两国安全合作的深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两国在军事领域建立的年度防务安全磋商（2001年）和战略对话（2013年）机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磋商，以及国防军事合作进行规划和安排；军事教育培训合作机制，推动两国军事院校和科研机构相互提供学习名额并开展科研合作。联演联训方面，两国从互派代表观摩对方军事演习，发展到了联合开创涵盖多军种的联演联训格局，陆军间的“突击”系列、海军陆战队间的“蓝色突击”系列、空军间的“鹰击”系列联合训练已成为两国军事合作的品牌项目。

国防工业合作是中泰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亮点，随着中国国防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中泰在武器装备采购、研发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入，中国向泰国提供了一系列武器军品援助，包括 T-69 型主战坦克、步兵装甲车、江湖级护卫舰、近岸巡逻艇、C-802 反舰导弹、红旗—9 防空导弹、CS-VP3 防地雷反伏击车、VT-4 主战坦克、S26T 型潜艇等。此外，在 2007 年中国国防部长访泰时，双方探讨了联合生产武器装备的可行性，^②并在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技术转让方面加深了合作。如泰国于 2009 年与中国签约转让 WS-1B 多管火箭炮系统生产技术后，将其整合到泰国陆军装备的沃尔沃中型卡车底盘上，并命名为 DTI-1 多管火箭炮系统。^③从军品贸易到研发合作，标志着中泰国防工业合作已经从简单的买卖关系发展为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在提升泰国国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关于面向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5 年 2 月 8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2/content_7002811.htm。

② 刘琳：《中国对东南亚军事外交：演变、现状及挑战》，《亚太海洋与安全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47 页。

③ 《泰国陆军爱上中国造远程火箭炮：精度堪比导弹》，环球网，2016 年 2 月 29 日，<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9CaKrnJUbbi>。

防自主能力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军事技术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增强了双方应对各种防务安全挑战的能力。

（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合作是中泰应对共同挑战的生动实践

随着全球安全环境的变化，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中泰安全合作的重心逐渐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双方在打击跨国犯罪、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和灾害管理等领域开展了务实高效的合作，取得显著成效，维护了两国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为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两国建立了禁毒情报交流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扫毒、打击毒品走私网络的执法合作，采取毒品预防教育、戒毒康复等综合治理措施，保证合作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针对网赌电诈、人口贩卖等跨境犯罪活动在东南亚地区蔓延的严峻形势，中缅泰三国警方不断深化务实执法合作，建机制、断通道、铲窝点，最大限度压缩该地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存发展空间。^①

湄公河流域安全合作是中泰非传统安全互助合作的典范。2011 年，震惊中外的“10·5”惨案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有效地完成了境外证据的调取和交换、移交在押人员、联合审讯、嫌犯身份查询、司法文书送达等工作。^②之后成立的澜湄执法合作中心，成为澜湄流域第一个综合性的执法安全合作类政府间国际组织，自该机制建立至 2025 年 5 月，流域各国执法部门已经开展了 153 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活动，有效应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和风险挑战，为澜湄国家各领域合作、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在公共卫生、灾害管理等领域，中泰两国的执行部门和民众都很好地体现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东方文化特质，在应对非典、禽流感、新冠肺炎等传染疾病危机或重大自然灾害时，双方各层级机构、组织和个人都能及时提供精神、物质上的鼓励和支持，开展信息和技术交流合作，寻求解决方案，共同应对危机。这些普通民众可感

① 《中缅泰联合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取得重大战果 累计 2876 名缅甸妙瓦底地区的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经泰国被分批押解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2025 年 3 月 14 日，<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876594/n5104076/n5104077/c10001591/content.html>。

② 宋清润、王斌：《全球安全倡议与中泰非传统安全合作》，《东南亚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98 页。

可知的互助合作，厚植中泰友好民意基础，为双方关系更上一层楼铺筑了情感桥梁。

二、中泰安全合作的潜力与前景

虽然中泰两国的安全领域的合作仍然面临较多挑战，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前景。

（一）稳定的政治关系和高层战略引领为中泰安全合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虽然泰国政局持续动荡，但对华友好、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已经成为泰国国内各政治派别的共识。保持政治关系稳定是双方的共同愿望。经常性的高层交流互访和战略沟通，为两国安全合作把舵定调。如 2022 年习近平主席访泰，两国发表《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为新时期中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2025 年佩通坦总理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对中泰下一步的安全合作做出规划和安排，强调在双边、澜湄合作等地区合作机制下，以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加强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网络赌博、洗钱等跨境犯罪，开展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双方将进一步讨论尽早确立适当协调合作机制，有效打击网赌电诈。双方同意积极参与“平安澜湄行动”，共同推进澜湄司法合作，维护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①

（二）广泛的共同安全利益为中泰两国深化安全合作提供动力源泉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泰两国都存在打击民族分裂势力、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等安全合作需求；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两国都深受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网赌电诈、人口贩卖、偷渡越境等跨国犯罪危害；传染疾病、气候变化、环境问题都给两国带来了治理压力；数字经济、新能源等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关于面向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5 年 2 月 8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2/content_7002811.htm。

新兴领域的发展带来新的安全挑战，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网络空间治理等议题日益成为中泰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兴领域”。这些都是两国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与挑战，也是两国继续加强安全互助合作的利益契合点。

（三）相近的安全合作理念为中泰安全合作提供思想基础

中泰两国都坚持国与国之间发展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即互不干涉内政。在历次泰国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时，中国始终保持客观中立态度，并声明“泰国国内局势发生的变化，是泰国内部事务。中国政府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原则为两国增进政治互信、强化安全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泰两国在政治安全上，都有着强烈的主权意识，反对西方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① 2025 年 2 月，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就中国籍偷渡人员从泰国被遣返回国答记者问时表示，此次遣返依据中泰两国法律、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进行，是依法合作打击偷渡等跨境违法犯罪、切实保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具体举措。^② 泰国总理佩通坦也表示，泰方依照法律程序和国际原则遣返中国籍偷渡人员，不存在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原则的情况。^③ 这种共同立场，为中泰共同打击跨境犯罪活动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增强了两国执法安全合作协调能力。

中泰两国均倡导多边安全治理模式，注重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安全问题，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反对域外势力干涉地区事务。这种理念上的契合为双方深化安全互助合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如泰国在 2012—2015 年担任东盟—中国关系协调国期间，就很好地实践了“推动对话合作”的理念。期间，在南海发生了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菲律宾向国际法庭提起非法仲裁事件，作为非主权声索国的泰国，通过斡旋沟通，成功说服东盟和中国同意召开东盟—中国非正式高官会议，这是黄岩岛事件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一次恢复互信的会议，为后续的系

① 曹筱阳：《中泰安全合作的基础、现状及趋势》，《东南亚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68 页。

②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就中国籍偷渡人员从泰国被遣返回国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2025 年 2 月 27 日，<https://www.mps.gov.cn/n6557563/c9984462/content.html>。

③ ปมสงฆ์“อุยงูร์”ถล่มจีน!! รัฐบาลยื่นปฏิบัตินโยบายตามขั้นตอนกม.-เคาะพินิจนิมนต์นุชชน, วันที่ 28 ตุลาคม พ.ศ. 2568, <https://www.infoquest.co.th/2025/473919>。

列对话磋商奠定了基础。在担任东盟—中国对话伙伴协调国期间，泰国和中国共同主持了 8 次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相关会议，促成双方保持接触和磋商，为缓和南海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①

三、中泰安全合作的战略意义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泰强化安全领域的合作，不仅是对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也是对新型国际安全观的诠释，在地区安全治理范式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及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一）为地区安全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中泰建交以来，两国在安全合作领域创下多个“第一”：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是第一个以“友情价”进口中国武器的国家，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和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开展武装部队联演联训的国家，^②是与中国开展禁毒合作最早、成效最好的东盟国家。中泰在地区安全治理合作上的探索，为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发挥了“先导示范”作用。除了双边合作外，中泰还积极参与澜湄合作框架、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合作平台的安全合作。这种以平等、互信、共赢为核心的合作思路及双边多边互补、互动的模式，不仅增强了东南亚国家的安全韧性，也为东盟与其他大国的安全协作提供了借鉴，为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二）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正能量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强调，“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

^① 朱贵平、施磊：《中美博弈态势下的泰国南海政策》，《南亚东南亚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83 页。

^② 曹筱阳：《中泰安全合作的基础、现状及趋势》，《东南亚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67 页。

类风险挑战”“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①中泰建交以来，在安全合作领域的良性互动，增进了互信，减少了误判，安全合作的成果直接惠及两国人民，这种“以人为本”的安全协作，增加了社会层面的认同感，使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为周边国家树立了合作典范，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了正能量。

（三）为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贡献了实践智慧

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架构，秉持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等“东盟方式”，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支持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推进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通过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实施相关合作项目，努力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②这是全球安全倡议所提出的重点合作方向。在此前的安全合作中，中泰两国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的支持下，在澜湄执法合作、湄公河水资源管理、平安航道建设等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实践，有效弥补了地区安全治理的短板，为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贡献了实践智慧。

四、结语

中泰建交 50 年来，在双方高层的战略擘画与政治引领下，两国间的安全合作实现了由点及面的历史性跨越，合作水平持续提升，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面对百年变局中日益复杂且加速演进的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中泰两国更应该珍视现有的良好合作态势，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指引下，继续拓展和维护两国共同的安全利益，夯实相近的安全合作理念基础，不断丰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安全内涵，共同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切实维护两国的稳定与繁荣，为打造持久的和平与共同安全贡献中泰智慧与力量。

^①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4content_7017717.htm。

^②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3 年 2 月 21 日，https://www.mfa.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

民心相通视域下的中泰社会文化交流与合作

唐旭阳

2025 年是中泰建交 50 周年，这一历史性节点为系统审视两国社会文化交流的发展轨迹提供了重要契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①，半个世纪以来，中泰社会文化交流始终是推动两国人民增进理解、深化友谊的重要桥梁，为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深厚的民意基础和精神动力。

建交 50 年来，中泰两国社会文化交流经历了从审慎接触到全面合作的发展历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和深刻的时代内涵。这一进程不仅见证了双边关系的历史性跃升，更诠释了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互鉴互学的时代价值。

一、“中泰一家亲”的历史脉络

中泰社会文化交流 50 年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从“隔阂走向理解、从理解走向认同、从认同走向务实合作、从务实合作走向共创”的清晰演进逻辑。每个阶段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和深刻的时代内涵。

（一）友谊奠基（1975—1985 年）：从隔阂走向理解

中泰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在错综复杂的冷战格局下艰难起步。这一时期，文化交流呈现出政府主导、规模有限、谨慎接触的特点。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交流对于破除隔阂、增进互信发挥了关键性的“破冰”作用。1975 年 10 月，广州杂技团访泰，作为建交后的首批文化交流活动，在消除彼此偏见、增进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6 年首个泰中友好协会成立，标志着民间交往渠道的初步建立。1978 年《中泰科技合作协定》的签署，为双边教育文化交流奠定了制度基础。1980 年两国正式启动互派留学生项目，拉开了教育领域务实合作的

^① 邹翔：《在合作中促进民心相通》，《人民日报》，2023 年 10 月 24 日，第 9 版。

序幕。

这一时期，虽然高层互访规模有限，但起到了关键的“催化剂”作用。1981 年诗琳通公主首次访华，开启中泰文化交流使者之旅，为“中泰一家亲”理念播下思想的种子。

（二）稳步发展（1985—2000 年）：从理解走向认同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中泰关系步入稳步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社会文化交流的显著特点是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双方在更广泛的层面实现了从理解走向认同。

1992 年泰国教育部正式将中文纳入外语教学体系，当时全泰国仅有 129 所华文学校和少数大学开设汉语课程。之后规模不断壮大，1997 年泰国招收了首批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2000 年，泰国教育部正式设立高中汉语课程。^① 汉语教育的蓬勃发展为中泰人文交流注入新动力。

与此同时，1988 年泰国成为中国公民首批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开启了人员往来的新篇章。1994 年中泰签订《旅游合作协定》，中国赴泰游客从开始的几万人到 2000 年突破百万大关，频繁的人员流动加速了“中泰一家亲”的进程。

（三）中泰一家亲（2000—2015 年）：从认同走向务实合作

进入 21 世纪，中泰关系在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全面提速。从 2003 年开始，“中泰一家亲”的表述逐渐出现在媒体报道中。2011 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泰国，对“中泰一家亲”进行了重要阐述。这一时期，双方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交流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务实合作。

中泰教育合作进入提质增效、创新发展的新阶段。2000 年，泰国成为首个正式承认中医药合法地位的海外国家，为中医药在泰国的教育和文化传播开辟了广阔空间。两国先后签署《文化合作协定》（2001 年）、《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定》（2007 年）、《教

^① 李谋：《泰国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瞻》，《南洋问题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62 页。

育合作协议》(2009 年)等,^①为双方搭建了文化、教育的规范化平台。早在 2002 年,中国就成为泰国第一大外国学生来源国。2006 年 8 月,泰国第一所孔子学院在孔敬大学成立,标志着孔子学院在东南亚地区设立的开端。^②同年,泰国共有 9 所孔子学院陆续成立,成为传播深化中泰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

2000—2015 年间,中泰双向旅游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8 年,泰国跻身中国十大客源国。2000—2015 年间,中国赴泰游客从 70.41 万增至 793.48 万,增幅近十倍;泰国赴华游客从 24.11 万增至 64.15 万,增幅 2.7 倍。^③频繁的人员往来为双边文化交流奠定了社会基础。

2003 年,泰国电视剧《俏女佣》成为首部进入中国市场的泰剧,拉开了影视领域合作的序幕。^④2012 年,中国电影《泰囧》在泰国取景,掀起票房热潮,此后《唐人街探案》等影片相继在泰国拍摄。影视交流成为中泰文化互鉴的生动缩影。

2012—2013 年,是中泰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2012 年 4 月,中泰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在曼谷设立首个面向东盟的海外文化中心。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同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⑤这些都为两国社会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政治保障。

(四) 深度融合发展(2015 年至今):从务实合作走向共创

2015 年以来,中泰社会文化交流进入了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两国文化交流从务实合作走向共创。2022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泰国时提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赋予“中泰一家亲”新的时代内涵。

① 周方治:《中泰建交 50 年:世纪关系的现代化演进动力》,《南洋问题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47 页。

② 张成霞、童星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南亚孔子学院发展历程及趋势分析》,《东南亚纵横》,2025 年第 1 期,第 4 页。

③ 李红:《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人口流动网络的证据》,《文化与传播》,2025 年第 1 期,第 88—89 页。

④ 李进、何英:《当前中国与泰国加强文化交流的前景分析》,《东南亚纵横》,2016 年第 1 期,第 65 页。

⑤ 《推动中国同东盟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29 日,第 4 版。

中国赴泰游客这一时期达到顶峰，2019 年中国游客赴泰人数达 1100 万人次，稳居入境泰国游客的首位，但 2020 年疫情暴发导致游客数量急剧下降。随后，中泰旅游交流迎来了新的历史性转折点。2024 年，中泰两国正式实施互免签证政策，中国赴泰游客数量达到 6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91.7%。^①

2018 年，泰国成为来华留学第二大国，人数达 2.9 万。^② 中国留学生也成为泰国高等教育的主力军。2022 年，中国在泰留学生更是突破 2 万大关，实现疫情期间的逆势增长。互派留学生规模的持续扩大，为两国培养了大批懂彼此国家语言文化的青年人才。

中泰影视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潮玩品牌在泰国大放异彩。泰国电影《天才枪手》以 2.71 亿元高票房创在华票房纪录，中国潮玩品牌泡泡玛特的 Labubu 在泰国掀起热潮，并创下海外门店销售纪录，体现了跨文化传播力和中泰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的新成果。2025 年，中国—东盟（泰国）电影文化周在曼谷举行，并举办首届泰中影视传媒促进协会论坛。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新媒体平台成为推动民心相通的新载体，如抖音、小红书以及抖音等平台涌现出大量致力于中泰语言文化传播的中青年博主。青年一代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力军。他们以跨文化视角构建叙事框架，用短视频的形式教授汉语或泰语，以沉浸式体验和真实化场景有效消解文化隔阂，增进相互理解。主流媒体机构同样顺应数字化趋势，运用短视频形式报道中泰人文交流的重大事件，形成了官方话语与民间叙事相互呼应的传播新格局。

二、民心相通：“中泰一家亲”的根基和实践路径

经过 50 年的发展，中泰社会文化交流在教育、文化、民间交往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从文化交流互鉴指数来看，泰国居于

① 《专访 | 互免签证促泰中旅游人文交流实现双向奔赴——访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新华网，2025 年 2 月 7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207/b65a30d702b7419285436c77d22a80bc/c.html>。

② 李红：《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人口流动网络的证据》，《文化与传播》，2025 年第 1 期，第 92 页。

东盟十国的首位，得分值达到 0.86，^① 这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

（一）地缘亲近与历史渊源的纽带作用

中泰两国自古以来就有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到访暹罗，成为中泰交往的历史佳话。这种地缘亲近优势和历史积淀是构建“中泰一家亲”理念的重要基础。

在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内核与泰国佛教社会的某些价值理念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例如，儒家强调的“仁爱”与佛教倡导的“慈悲”在关怀他人方面有所呼应。^② 泰国社会也同样追求“和谐社会”理念，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思想相通，为民心相通提供了价值支撑。

（二）政治互信与利益交融的助推作用

泰国与中国建交后，借助中国的支持，是泰国克服国力不足、维护和拓展利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③ 进入 21 世纪，中泰关系实现全面提速，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频繁的高层互访、务实的经贸合作、多项谅解备忘录的签订都极大增强了战略互信，使两国利益深度交融。2023 年 6 月，诗琳通公主第 50 次访华，为中泰友好关系作出卓越贡献。同时，中国—东盟、澜湄合作、“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也为深化双边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物质基础。

（三）多维文化交流的融合作用

教育传播、传统医学、精神文化等多维交流实践的深度融合，为两国关系的持续深化提供了多元化的实现路径和社会基础。

孔子学院在泰国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建立 17 所，占东

① 晏月平、李忠骥、徐晓勇等：《中国—东盟文明交流互鉴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86 页。

② 林饶关：《中国文化在泰国的影响》，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7 年，第 83 页。

③ 宋清润、田霖：《利益、认知的耦合与泰国长期对华友好合作政策》，《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14 页。

盟十国的 36%，^① 吸引超过 130 万的中文学习者。并形成两所以传播中医药文化为主的孔子学院，分别是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和华侨崇圣大学孔子学院。此外，高校合作办学、互派留学生都体现出中泰交流日益机制化、特色化的趋势。

中医药文化交流是中泰传统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3 年，泰国已有以华侨崇圣大学为代表的近十所高校开设中医学专业，有超过 1800 名获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② 2025 年也是泰国中医合法化 25 周年，泰国中医百年庆典大会在曼谷召开。中医作为泰国传统替代医学与泰医共同成为泰国卫生保健体系的重要支柱。精神文化对话进一步促进两国深层次文化交流。2024 年 12 月，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抵达泰国，泰国十世王和总理佩通坦出席见证。2025 年 2 月，泰国佛统大乘寺举办“庆祝中泰建交 50 周年暨恭请六祖圣像供奉仪式”，进一步深化了两国佛教界的交流合作。这些高规格宗教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更为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文化支撑。

（四）新媒体平台创造交流新格局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为中泰文化交流注入了新活力。两国网络博主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用镜头架起沟通桥梁，用创意传递文化理解。这种自下而上、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一是打破传统媒体单向传播局限，实现双向互动；二是构建多元立体的对话空间，促进民众深度文化交流；三是以青年群体为主体，为中泰友好关系的代际传承提供了新动力。与此同时，中泰影视合作在新媒体时代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短视频+影视”的传播模式，有助于突破传统发行渠道的局限，实现影视作品的精准推送和快速传播。

（五）价值认同的内生动力

民间交往作为中泰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华侨华人的桥梁功能相互促进，共同构建了民心相通的深厚社会基础。泰国华人是东南亚

① 张成霞、童星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南亚孔子学院发展历程及趋势分析》，《东南亚纵横》，2025 年第 1 期，第 10 页。

② 唐旭阳：《“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在泰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翻译与传播》，2024 年第 2 期，第 92 页。

华人中融入当地社会最充分的群体。华人华侨在中泰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的桥梁作用，既是中华文化在泰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泰国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关键媒介。与此同时，两国已缔结 41 组友好城市和省府。^① 旅游往来作为最直接的民间交往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双边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泰一家亲”理念的深化提供了最广泛的社会支撑。

三、结语

中泰民心相通的实现并非偶然，官方和民间的“双轮驱动”、交流深度融合及传承创新是中泰人文交流的三大重要特点。^② 中泰关系经历了从分歧走向协同的历史跨越，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在“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文化互鉴”框架下取得全面发展。^③ “中泰一家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在社会文化交流领域的持续深耕。站在“中泰友谊金色 50 年”的历史新起点，中泰社会文化交流应着眼于服务双边关系发展的大局，以民心相通为本，以机制化、特色化、高质量为方向，为社会文化交流合作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夯实民意基础。

[责任编辑：李丽、郑佳]

① 《中国同泰国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5 年 4 月，https://www.mfa.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sbgx_676936/。

② 《中泰建交五十载：金色友谊铸就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国网，2025 年 5 月 28 日，http://fangtan.china.com.cn/2025-05/28/content_117899831.htm。

③ 周方治：《中泰建交 50 年：世纪关系的现代化演进动力》，《南洋问题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47 页。